十八大主旋律：改革與發展

□紀碩鳴

神州點面

十八大換屆，新的人事安排其實已經在黨政軍及地方中展開。黨內最核心的中央委員、政治局委員，直至最高領導的中央常委還需要大會選舉產生，這是大會的既定程序，也是中共十八大需要確定的組織路線。但最爲重要的是，十八大還需要確立未來中國舉什麼旗，走什麼路，往什麼方向去的政治路線。毫無疑問，中國走社會主義道路的大方向不會動搖，繼續三十多年改革開放得到發展成果的這一條路要走下去。這一定是十八大的重要旋律。

繼續改革開放以謀求中國發展必將是中共十八大再次堅定的政治路線。始於上世紀八十年代的改革開放是突破「文革」繩索的利器，是從「極左」的污泥濁水中拔腿的動力。從農村、從經濟領域開始，邁向城市、邁向司法、文化、社會，直接進入政治體制領域。改革的核心就是指向極「左」路線，要下放權力，解決權力過於集中的弊端，由此走向市場經濟，走向法治化，走上社會多元發展的光明大道。在短期內，不僅創下中國經濟繁榮昌盛奇迹，大大改善百姓生活，也讓中國經濟總量排名世界第二，並確立中國在世界上的地位。

三十多年後的今天，中國仍然遠沒有走完改革開放之路，仍然需要面對衆多發展中以及固有的問題。經濟可持續增長，貧富差距改善，權力如何接受民衆監督以及貪腐滋生不斷的防範，富裕起來的文化和價值觀等等問題都需要面對，甚至需要接受「極左」回潮的新挑戰。還有，隨着經濟全球化，中國的強盛也讓國際環境發生變化，引來國際及周邊一些國家另眼相看，他們既依賴中國又對中國疑慮重重。這些都是改革開放取得成就下的新情況，需要中國在發展中正視。而這些又都需要以更爲科學明智的改革開放態度，制定全新的改革開放路線圖去謀求新的發展來應對。

深化改革開放應對挑戰

十八大固然要總結、讚賞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曾經取得的成就，爲過去五年，甚至十年的輝煌鼓掌，這是不爭的事實。但這些年發展陽光下帶來的陰影，在璀璨中透露出的腐朽也觸目驚心。十八大面對未來的挑戰，可能需要以更爲開放，更深度的改革來應對。中國共產黨可能更需要經受考驗的是，如何帶領十三億中國民衆走向更爲科學的發展道路；如何鞏固取得的經濟成果，並逐步取得政治成果；如何樹立執政黨在民衆中的威望，以鞏固執政地位；如何走向更爲民主爭取民心。這些都需要在十八大中確定更爲深度的改革開放總路線，讓全國民衆對未來有信心，同時也督促十八大選舉產生的領導者在執政位子上始終牢牢把握這一路線。

深度改革的呼聲日益高漲，而且來自頂層。胡錦濤總書記在中共省部級主要領導幹部專題研討班開班式上發表重要講話，從把握當代中國發展方向和道路的高度，從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進而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的高度，從黨和國家事業發展全局的高度，強調必須毫不動搖推進改革開放。胡錦濤還特別強調，推進政治體制改革，必須堅持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依法治國有機統一，發展更加廣泛、更加充分的人民民主，保證人民依法實行民主選舉、民主決策、民主管理、民主監督，更加注重發揮法治在國家和社會治理中的重要作用，維護國家法治的統一、尊嚴、權威，保障社會公平正義，保證人民依法享有廣泛權利和自由。中國共產黨沒有忘記鞏固改革成果的首要在於深化改革，胡錦濤的講話是爲十八大繼續突出改革、深化改革鋪陳，也表明十八大推動深化改革時不我待的迫切性、政治體制改革放入議事日程的重要性。

經過三十多年改革開放的中國經濟也在國際大環境變化中走到了十字路口。即使在一些經濟改革的議題上，即將召開中共十八大也同樣被關注。經濟學家吳敬璉在接受媒體採訪時公開表示，期望中共十八大能達成新的改革共識。吳敬璉表明自己的立場和態度，稱只有堅持市場化、法制化、民主化的改革道路，中國發展才能延續下去。這本身需要改革來延續。

抓住契機推進體制改革

前不久，原深圳市委書記厲有爲發表長文《時間就是生命，改革就是求存》，洋洋灑灑的萬言中，面對十八大當前的形勢，厲有爲提出了十分詳盡的「關於政治體制改革若干問題的思考」，從十多個方面詳盡論述政治體制改革的必要性、可能性和重要性，以及緊迫性，並疾呼「時間就是生命，改革就是求存」。在中共十八大召開前夕，改革成爲媒體和理論界熱議的話題，改革成爲中國發展、民衆共享成果出路的滿懷期待時刻，黨內幹部的呼聲更爲引人關切。要解決改革中出現的衆多有損執政黨的腐敗問題，要讓人民共享改革成果，厲有爲認爲，就是要繼續改革，深化改革。十八大不能不以主基調來議論、決策這些問題。

十八大在人民大會堂亮燈的日期越來越近了，應該確信，改革開放堅持發展是中國執政黨這次大會的主旋律，同時也應該相信，在改革開放的前期，以市場化爲目標的經濟體制改革走的較快，而以民主化進程弱化權力、監督權力的政治體制改革一直在作時機選擇。十八大將會是中國再改革求發展的契機，也是良機。

作者為資深評論員

為民「剪布」 黃 牛

改革收入分配任重道遠

□陳文鴻

中國的收入差距擴大問題嚴重，十八大新一屆領導層面對挑戰，責任重大，尤其是中國經濟發展模式正在轉變，風險不小，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能否成功，令人關注。

衆論十八大

中共十六大開始時，中國已經面對着嚴重的收入差距擴大問題。這主要是市場失控因素影響，沒有非市場力量的干預，單只市場的不平等競爭必然帶來不公平的分配。所謂馬太效應，富者愈富，貧者愈貧。這也是讓少數人先富起來政策的結果。歷史的經驗顯示出，少數人先富起來與大多數人共同富裕是對立的矛盾。先富起來的少數人不會容許社會分配轉爲共同富裕的機制。

中央出台系列措施

90年代應該是中國收入分配轉趨不平等惡化的時候。所以十六大之後，2003年開始，應對收入分配差距帶來的壓力，領導層相繼出台了一系列措施，包括免除農業稅，建立最低工資制，加強勞動執法等。因此2003年被視爲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起點，也是中共十六大、十七大關注的一個工作重心。

問題是，2003年以來近十年。中國收入差距進一步擴大。2010年堅尼系數達到0.438（比香港低但卻在國際上已超越危險的界線）。90年代以來，每年皆以0.1個百分點的速度擴大。形勢並沒有扭轉。這個結果反映着中國勞動收入與消費佔國民生產總值的比例，自90年代以來一直下降，沒有轉變。以內地的一些計算看，過去十年裡，勞動收入佔國民生產總值的比例由50%以上降至接近45%，最終消費從62%降至47%，居民消費由46%跌至34%。這與OECD國家的發展趨勢相逆，與成功的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相比也極爲遜色。後者的成功在於把市場經濟的馬太效應用政府因素控制住。居民消費與勞動收入佔國民生產總值的比重下降，代表着企業利潤佔的比重上升，投資和政府收入上升，後者包含着不少公費浪費和失誤投資（如面子工程、政績工程和豆腐渣工程）。總言之，中國經濟發展迅速，最大得益者不是付出血汗的廣大人民，而是企業主（不少是外國企業資本家）、官員和管理層，特別是壟斷行業的壟斷利潤集中，之所以成爲社會大問題，也反映着收入差距的只增不減。

實現「提低擴中控高」

以胡錦濤爲核心的十六大、十七大領導層，在2004年開始調研，經歷八年時間，由發改委主持制訂的收入分配改革總體方案雖經幾番修改仍被拖延。據說今年四季度可制定並出台相關政策，能否趕及十八大出台還有懸念。2009年底，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調整收入分配的政策立場後，「十二五」規劃也把基本原則羅列。可惜，在2009年前爭論不已。2009年後，即使「十二五」規劃已立法，仍然未有具體內容和相關政策。此足以反映出「先富起來的人」對「共同富裕」的抗拒。據說總體方案中重要的「工資條例」受到壟斷行業的強烈反對已經「夭折」，可見爭持之激烈。

即使發改委內亦有不同意見。例如發改委主管有關工作的部門，在2009年堅持「初次分配注重效率，二次分配注重公平」，今年開始被迫轉變爲初次分配要「公平與效率兼顧」。前者屬傳統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自由主義觀點，自上世紀三十年代以後已經不再作爲發達市場經濟的主流政策，反而後者更接近歐洲福利資本主義的政策取向。國家「十二五」規劃裡已明確列出。

見諸「工資條例」的胎死腹中，「十二五」規劃提出的完善工資指導制度、擴大工資集體協商覆蓋範圍、縮小行業間工資水平差距等主張，亦未必容易在將出台的方案裡可變成具體政策。而「十二五」規劃在收入分配中提的「提低、擴中、控高」，亦不易完全實現。

要有更大魄力智慧

十八大開局時，應當在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方面有一階段性的成就，否則更重要的城鄉差距、農民工的問題，以及再分配範疇裡社會保障的改革完善工作亦會更難推行，中國收入分配的問題或許會進一步惡化，而不會扭轉。

觀乎中國社會城鄉都曾出現不穩和民衆公開抗權的現象。十八大新一屆領導層面對的挑戰和責任重大，尤其是因爲中國經濟發展模式正在轉變，經濟風險不小，加上政治風險。新一屆領導層在這方面的政策怎樣，屆時會蕭規曹隨，抑或是會有更大的魄力和智慧完成胡溫未竟之功，令人關注，我們寄予美好期待。

（系列之一）

作者為香港理工大學公共政策研究所所長、中國商業中心主任

亞歐峰會關注經濟復蘇

□邱 波

國際話題

以「和平摯友，繁榮夥伴」爲主題的第九屆亞歐首腦會議於11月5日至6日在老撾萬象舉行。溫家寶總理代表中國參加此次會議，並對老撾展開正式訪問。在全球經濟依舊面臨下行風險的情境下，本次會議的重要性無疑值得關注。事實上，外交部部長助理馬朝旭在中外媒體吹風會上，已就中方對本次會議的立場給出了表達。馬朝旭表示：溫總理將在會上闡述中方對世界經濟金融形勢和中國當前經濟形勢的看法，關於亞歐合作促進世界經濟穩定增長的建議，提出中方關於促進亞歐合作的有關倡議，同各方就共同關心的全球性問題交換意見。

避開「爭議」話題

毫無疑問，不論是亞歐峰會創辦的初衷，還是本次會議主題所想傳遞的信號，抑或馬朝旭在中外媒體吹風會上所釋出的中方立場，實際上都應該是將經濟復蘇作爲一切討論工作的首要選項。然而，認知情況不一致也是國際場合的通行慣例。日媒傳出的消息是，參加本次峰會的野田佳彥會將其在聯合國大會上所曾表達的有關「領土領海」主張作用於本次亞歐峰會的場合；雖然消息給出野田「或將避開釣魚島」用語，以顯示日方的克制。

應該講，不論是野田在聯合國大會上所強調的「在尊重國際法的原則基礎上解決國與國之間的領土領海糾紛」之政策主張，還是玄葉歐洲三國行的「敗興而歸」，似乎都凸顯了日本在中日釣魚島博弈上的「黔驢技窮」。然而，在爲中方的優勢表現而感到寬慰的同時，卻又隱隱體察到某種不安。坦率地說，聯合國場合只適宜闡釋基本立場，而多邊國際場合則更容易成爲幫助相關國家就各自感興趣的話題而展開或合作或交鋒的開放性舞台。

正因爲這種多邊國際場合存在很多難以準確評估的未來世情走向，因此，筆者自然很容易爲自己的「不安」而羅列出諸多能夠經得起各方爭論的「擔憂」依據。不是嗎，如果在亞歐峰會場合上演的中日釣魚島博弈只限於雙方，實際上很難定性誰佔優勢；然而，如果考慮到參與該場合的國家各有訴求，中國的被動境地也就一目了然了。人們知道，與中國有領海爭議的菲律賓和越南等國家也同樣是亞歐峰會的成員國，它們不會在這個場合對中國的南海政策提出指責嗎？不僅印度對參與南海議題充滿熱情，甚至連歐盟也曾表達過對南海爭議的關注。試想，倘使菲越等國因爲日本鼓弄，也大張旗鼓地喧囂起領海爭議話題，然後再加上美國強調的「南海行爲準則」對歐洲與印度的影響，中國又將陷入怎樣的困境呢？

化解「被動」局面

正因爲中國的安全困境趨向複雜，因此，「就事論事」地辯駁海權爭議，實際上會使中國陷入無從化解的極度被動局面。

可以說，面對一直沒有公理的人類世界，中國要想在亞歐峰會的博弈場合中不落下風，作用點就顯然應該以「經濟復蘇」爲主要選項。緣由很簡單，倘使中國釋出善意的經濟主張能夠引發共鳴，與領海爭議沒有關聯的國家自然就會將關注重點轉向與復蘇有關係的領域，從而將美日等國家共同鼓弄的領海話題消解於無形之中。

其實，外交部部長助理馬朝旭就溫家寶參加亞歐峰會而在中外媒體吹風會上所釋出的中方基本策略，已然與筆者的相關主張幾乎完全一致。就具體的角逐程序來說，倘使海權爭議國闡釋其各自立場時，中國的反應不應該是憤怒，而是「輕描淡寫」的指出：雖然每個國家都有政策主張的權利，但亞歐峰會的主題業已被確定爲「和平摯友，繁榮夥伴」，因此，還是讓我們將經濟復蘇話題來作爲探討的重點吧；至於爭議話題，我們完全可以「個對個」的琢磨，而沒有必要因爲雙邊爭議而破壞共同關切嘛！倘使如此，可輕易破解激盪話題。

作者為資深評論員

遏樓價新措施是雙刃劍

□曾淵滄

宏觀微觀

在住宅樓價不斷創新高的時候，特區政府終於果斷地推出二項打壓需求的措施：一是強化原有的特別印花稅（SSD），另一是徵收新的買家印花稅（BSD）。

政策推出後，引起巨大的回響，不同利益背景的人自然有不同的反應。不過，整體而言，支持這項新措施的香港市民是佔多數的。當然，不同的聲音依然很多。同時，一些人也不斷地逼政府，要求政府把打壓的範圍擴大至商業樓宇，另一些人則要求有更多更嚴厲的打壓措施。

任何打壓樓市的措施都是非常敏感的資訊。因此，政府內部高層也不可能全面大規模的公開諮詢。僅由數名負責的司局長及其常任秘書閉門思考，以後拍板推出，而世界上也的的確確不可能有任何政府的措施政策能八面玲瓏、全民得益。因此，新的SSD與BSD引起衆多的爭論是正常的。其中有一些情況也許是司局長們在決策時沒有留意到的，需要關注。

加重舊樓收購負擔

兩項新措施中，相信討論得最多的是新的BSD，即非香港永久居民及以公司名義買樓者皆需付額外的15%印花稅，地產界有意見認爲，BSD推出後，全香港的市區重建計劃可能只剩下市區重建局一個單位在進行，所有私人企業、地產商都會停止收購舊樓的行動。因爲以公司名義收購舊樓得付額外15%的BSD，負擔加重。收購舊樓是一項商業行動，既是商業行動，當然只會以公司的名義進行收購，而不是以個人名義進行，特別是上市大企業。舉個例子，過去多年，恒基地產收購不少舊樓，拆卸後重建，是市區重建的一個重要部分，在新的BSD條例之下，收購舊樓的成本增加15%，而且有時更不止15%，因爲恒基地產可能不是直接向個別舊樓業主買入舊樓，而是由一些中小型的公司向個別舊樓業主買入舊樓，等收集差不多了，才轉售給大地產商進行重建。收購舊樓的過程可能得用好多年的時間，積壓大量資金，現在再加上15%的BSD，的確足以阻礙市區重建工作，最後只剩下獲得豁免權的市區重建局會收購舊樓。

新加坡早在去年就已推出BSD，也向公司買家徵收買家印花稅，爲什麼新加坡沒有這個問題？原因是新加坡的市區重建早在三十多年前完成，市區裡該重建的已經全部拆掉重建了，未拆的全部是新加坡政府下令保留下來的古蹟。今日，新加坡所有的舊樓重建項目，幾乎全是整幢大廈的業主在超過80%支持授權之下進行公開拍賣而賣給地產商進行重建，這種集體拍賣的行爲容易處理，可以獲得豁免繳交BSD。但是，香港目前市區重建過程仍未流行集體拍賣，仍然依靠這些中小型地產商一個單位一個單位的收購，地產商之間也可能互相「打釘」，即持有一至數個關鍵單位，用來與收購者討價還價，爭取更好的收購條件，甚至可以互相交換所打的「釘」。

還有，過去除了個人買樓自住或投資外，也有不少企業，大中小型企業都有，會買入物業用作投資，也有一些企業買入物業當員工宿舍，加徵BSD之後，這項行動也會停止。因此，也有地產界人士認爲，BSD扼殺企業的物業投資，這對一個像香港那樣標榜開放的國際都會而言，有一定的負面影響。

不過，社會上有另一種聲音，認爲新的措施有漏洞，有人可以利用公司名義買樓，只需要一次過付15%BSD，從此這個樓盤單位就可以通過轉換股東而轉換實際的業主，避開一次又一次的SSD。特別是目前SSD的稅率與BSD的稅率有5%的差距，以個人名義買樓，半年內賣掉得付20%的SSD，但以公司名義買樓，轉換公司股東以實質上的轉換業主，就不必付20%的SSD，只需付15%的BSD。實際上，兩年前第一次推出SSD時，相信也有人利用公司名義來買樓，以避開SSD，也許這是舊SSD之所以達不到預期效果的原因。

亦令市場放盤減少

此外，市場上還有一些看法，認爲SSD無效，因此新的SSD也無效，是多餘的。他們認爲舊SSD已經有效趕走炒家，實在不需要新的加強版SSD，而且，不少人認爲，SSD趕走炒家的結果是市場上放盤的供給少了，每一名買家買了住宅單位之後，爲了不願付SSD，在兩三年之內不會放盤出售，市場上二手盤的供應賣一個少一個。他們認爲供應少了是樓價上升的原因，認同這種觀點的市民不少。實際上，過去兩年，地產代理天天就是以這個道理游說其客戶買樓。另外有一些人認爲，SSD的時間由兩年延長至三年，而且稅率提升5%，誤殺良民的機會也增加了。一些不是炒家，原本打算買樓自住者，如果突然因工作收入有變，無力供樓而打算賣樓，就得繳交額外的SSD，一種懲罰，懲罰非炒家。

我認爲，舊的SSD是針對短炒的炒家，因此，持貨超過一年者，SSD只是5%，這是不難負擔的，過去大半年就有不少業主寧可多付這5%的SSD也賣樓套現。

新的SSD加上BSD，不單是趕走炒家，相信連打算買樓收租的投資者也會打退堂鼓。新的SSD稅率加了5%，持貨一年以上者的SSD由5%加至10%，是加了足足一倍，而且徵稅期延長至三年，多少人有信心三年之後目前的超低利率仍會維持？三年之後樓價是升是跌？誰有把握？

炒家、投資者皆被趕走，需求大減，樓價就不可能不跌。

作者為城市大學副教授，博士